

21 世纪汉学展望

□任继愈

20 世纪 ,是世界各族人民文化大交流的时代 21 世纪 ,交流的大潮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创新局面。如雨后春笋丛生崛起一般 ,世界各国大学纷纷开设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汉学已成为当今世界的显学。

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的原因 ,形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 ,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 ,这总归是事实。在多元化的世界交流中 ,只有善于利用 ,互相尊重 ,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 ,各方才能从中受益。

学术研究与经济交流不同 ,在近期看不出显著的效果 ,但是事实证明它的影响和效果将远远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 ,甚至产生当时意想不到的效果。做得好 ,将造福于后代 ;做得不好 ,也会造成不可补救的遗憾。

文化现象研究 ,是研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社会的总钥匙。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特色反映了民族的特色。一切文化都有两个层面 ,一是生活文化 ,二是观念文化。生活文化 ,包括饮食、服饰、住房及音乐、舞蹈等生活表层现象。生活文化是每个民族都具备的。至于观念文化 ,则只有拥有完善的文字和先进的科学的那些相当发达的民族才具备 ,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旅游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很容易发现这个地区的文化特点。至于观念文化 ,它处在思想的深层 ,它是一个民族抽象思维能力高度发达的精神产品。观念文化的出现 ,至

少要有完备的文字、一定发达的科学,有丰富的文学、哲学精神产品。可见,观念文化不是每一个民族都具备的,它是一个民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大体说来,观念文化形成于文化发达地区,如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

我们现在只说中国。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贯串古今的文明大国,它既古老又年轻。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中少不了中国,与中国并肩的几个文明古国后来被侵略者征服变成殖民地,他们的古老文化被迫中断了。只有中国连绵不断地持续发展了五千年之久,不但未衰败,反倒更焕发出无限生机。

中华民族生活、栖息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以此两大流域为基础,它的文化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直到今天,仍生气蓬勃地走着自己的路。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当前汉学研究的切入点。今天的中国是从古代中国演变过来的,研究汉学,必须从中国的生活文化入手,这是第一步。生活文化、衣食住行这些表层文化容易看到,也容易理解。但是观念文化方面却是另一回事,比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家庭观、宗教观诸多方面,以及世界普遍关注的对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中国人与西方社会认识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如果不经过深入交流,很难做到真正了解。如何开展有效的沟通,也是我们从事文化交流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品格,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失个性的兼容性;与时俱进的应变性;取之有节的建设性;刚柔相济的进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除了这些民族文化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民族智能——思想方法的生生不已的发展观和大不遗细的全局观,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当有待于汉学家们深入发掘,使它走出国门,为全世界做奉献。

汉学家首先是语文桥梁建筑师,疏通语文交流的桥梁。这方面,经过我们前辈几代人的努力,今天已成绩显著。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自然会进入观念文化领域,接触到中华文化的核心,必然涉及哲学、文学、宗教、史学方面,这是21世纪汉学研究从语文文字到理论思维的必由之路,也是今天的汉学家与前一代汉学家显著不同之处。

根据中国学者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历程,来考察我们的汉学研究,不无某些可供参考之处。“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界关心“西学”。当时的“西学”的涵义,正如今天西方学者心目中的“汉学”,涵义相当广泛,也可以说相当含糊。“西学”既包括西方(主要是欧洲)的文学、哲学、宗教,也有社会学、政治学,当然也有自然科学。中国学者从但丁、荷马、莎士比亚以及托尔斯泰、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接触到大量的各种流派的著作以后,当时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由简略趋于详备,由模糊趋于清晰,由略观大意逐渐深入到学说内容。对“西学”的理解逐渐具体、深刻。

当前,“汉学”研究的范围有多大,学术界理解很不一致,这是对不同文化的认

识、了解的必由之路。正像当年中国学者对“西学”一样,随着研究的开展,对中国观念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具体,“汉学”研究范围必将会自然解决。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学诸多领域都可以作为研究者的切入点。钻研既久,自然会得到明确的共识。到了21世纪最近的五十年,汉学研究形势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可以预言,五十年后,随着世界多元文化观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和东西方观念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将出现以客观、平等、科学的态度来认识文化的特点,逐渐发现不同文化的优点的现象。我们将看到不同文化深入交融,互相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共同受益,为人类建设共同珍惜的文化宝库。它的建设意义将超出学术界研究的小范围,每个文化发达的民族都将从中受益,从而开创世界文化的新局面。这种光明前景应当说并不遥远。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之树,它扎根于各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各民族都受它赖以生存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观念文化的制约。

文化的民族性、地区性还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比如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难免干扰人们的客观分析。有的民族有高度的文化成就,如果这个民族当时的国力处在贫弱的劣势,它的文化珍品就不会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以人废言”。弱势民族的文化随之也处于劣势。有的强势民族,往往把它们弊端百出的文化强加于劣势民族。这种状况,曾经受过殖民统治的民族都有深切的感受。遇到这种情况,既要由文化本身来争取应有的地位,也要借助民族振兴的努力,加速改变其劣势处境。民族处境改善了,它的文化也会随着增加身价,受到应有的尊重。

中华民族的文化本来可以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大批优秀成果贡献给全人类,从而丰富人类文化宝库。只是由于近一百多年来,国势不振,处在被奴役的地位,其优秀文化也受到株连。新中国建立后,综合国力强大了,中华文化也随之受到比过去更多的重视。

生活在21世纪的每一个民族,都要珍视这个机会,认真总结各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用以指导前进的方向,为全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 的历史与现状

□ 阎国栋

俄罗斯汉学与西方汉学、东方汉字文化圈汉学共同构成当今国际汉学的三大板块^①，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当今我国对西方汉学以及东亚汉学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范围迅速扩展，角度不断求新，深度逐步加强。与此相比，对俄罗斯汉学的研究明显滞后，不仅开展晚，而且就研究成果而言，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随便翻开一部中外文化关系史论著，关于俄罗斯汉学不是付之阙如，就是蜻蜓点水。显然，这种状况不仅不符合我国学术发展的要求，同时也与俄罗斯的汉学成就不相匹配。

中俄两国间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历史上官方及民间的交流密切而频繁。俄罗斯汉学自18世纪始，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学者辈出，著作充栋。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汉学研究规模之大、人员之多、力量之强，世界罕见。帝俄时期重要的汉学家有罗索欣（И. К. Россохин，1717—1761）、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1716—1786）、阿加福诺夫（А. С. Агафонов，约1751—1794）、弗拉德金（А. Г. Владыкин，1761—1811）、比丘

^① 还有学者认为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国际汉学由三大学派构成：继承了南欧天主教来华传教士传统的欧洲大陆学派、继承了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传统的俄罗斯学派以及以英美外交官和新教徒为主体的英美学派。参见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第151—152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卡缅斯基(П. И. Каменский ,1765—1845)、列昂季耶夫斯基(З. Ф. Леонтьевский ,1799—1874)、卡法罗夫(巴拉第)(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1878)、瓦西里耶夫(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斯卡奇科夫(孔气或孔琪庭)(К. А. Скачков ,1821—1883)、扎哈罗夫(杂哈劳)(И. И. Захаров ,1814—1885)、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柏百福(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等,而比丘林、卡法罗夫和瓦西里耶夫更被誉为帝俄汉学的三巨头,^①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广泛声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引用过俄罗斯汉学家的译作,^②从而使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成为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到的惟一中国人。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出现了五位汉学院士:阿列克谢耶夫(阿理克或阿翰林)(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 ,1891—1970)、齐赫文斯基(齐赫文)(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1918—)、米亚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 ,1931—)、季塔连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1934—)两位通讯院士:费德林(Н. Т. 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与李福清(Б. Л. Рифтин ,1932—)。此外,涅夫斯基(聂历山)(Н. А. Невский ,1892—1937)、休茨基(楚紫气)(Ю. К. Щуцкий ,1897—1938)、鲍·瓦西里耶夫(Б. А. Васильев ,1899—1937)、弗卢格(К. К. Флуг ,1893—1942)、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 ,1892—1964)、拉祖莫夫斯基(К. И. Разумовский ,1905—1942)、科洛科洛夫(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1896—1979)、龙果夫(А. А. Драгунов ,1900—1955)、鄂山荫(И. М. Ошанин ,1900—1982)、马丁诺夫(А. С. Мартынов ,1905—1975)、艾德林(Л. З. Эйдлин ,1909—1985)、菲什曼(О. Л. Фишман ,1919—1986)、尼基福罗夫(В. Н. Никифоров ,1920—1990)、维·彼得罗夫(В. В. Петров ,1929—1987)、缅希科夫(孟列夫)(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1926—)、华克生(Д. Н. Вакресенский ,1926—)、谢列布里亚科夫(Е. А. Серебряков ,1928—)、佩列洛莫夫(嵇辽拉)(Л. С. Переломов ,1928—)、霍赫洛夫(А. Н. Хохлов ,1929—)、瓦赫金(Б. Б. Вахтин ,1930—1981)、列·瓦西里耶夫(王希礼)(Л. С. Васильев ,1930—)、克罗尔(Ю. Л. Кроль ,1931—)、克留科夫(刘克甫)(М. В. Крюков ,1932—)、克恰诺夫(Кычанов ,1932—)、博克夏宁(А. А. Бокщанин ,1935—)以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少壮派代表马良文(В. В. Малявин ,1950—)、科布泽夫(А. И. Кобзев ,1953—)、陶尔奇诺夫(陶奇夫)(Е. А. Торчинов ,1956—2003)、克拉夫措娃(М. Е. Кравцова ,1953—)等都是著述丰厚的著名汉学家,在各自不同的学术领

① [苏]瓦·阿列克谢耶夫:《东方之科学》(В. М. Алексеев,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Москва, 1982. С. 57.)。

② 《资本论》第一卷,第146—14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汉学著述不仅凝结着俄罗斯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文化氛围中的存在状态。我们只有对俄罗斯汉学进行扎实的研究,才有可能领略俄罗斯学者运用本国人文思想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回应他们的观点,促成学术交流健康态势的形成,同时促进许多相关学科,特别是中俄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的开展,从而推动中俄关系研究的全面发展。

中俄两国间的文化联系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自19世纪下半期以来,俄国侵占我国领土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学者研究的主要课题,如清代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民国时期陈复光的《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1947年)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76、1978、1981、1990年)等等。解放以后,有关俄罗斯文学乃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在我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如戈宝权的《谈中俄文字之交》^①、陈建华所著《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汪剑钊的《中俄文字之交——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新文学》(漓江出版社,1999年)以及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年)等。而对于中国文化在俄国的流播和影响,则少有人研究。

回顾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走过了一条短暂却不平凡的道路。从研究规模、研究成果和对于这种学问的认识变化上看,我们似乎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准备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振兴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最早对俄罗斯汉学进行研究的学者是莫东寅先生。他撰述了《汉学发达史》(文化出版社,1949年)一书,对欧美汉学进行了回顾和研究。在第六章中,作者介绍了法、英、德、荷、美、俄等国的主要汉学家及著作。在俄罗斯部分,莫东寅概述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的比丘林、扎哈罗夫、卡法罗夫、贝勒士奈德(Э. В. Бретшнейдер, 1833—1901)、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ский, 1800—1878)、西维洛夫(Д. П. Сивиллов, 1798—1871)、沃伊采霍夫斯基(О. П. Войцеховский, 1793—1850)、瓦西里耶夫、伊万诺夫斯基(А. О. Ивановский, 1863—1903)、伊凤阁(А. И. Иванов, 1878—1937)、阿列克谢耶夫等十余位汉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汉学成就,同时还介绍了伊·施密特(И. Я. Шмидт, 1779—1847)、帕拉斯(П. С. Паллас, 1741—1811)、鄂登堡(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1863—1934)、巴尔托尔德(В.

^① 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В. Бартольд, 1869—1930)、波塔宁(Г. Н. Потанин, 1835—1920)、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 1863—1935)、拉德洛夫(Ф. В. Радлов, 1837—1918)、弗拉基米尔措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等东方学家对中国蒙古、满洲、新疆、西藏以及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研究情况。莫文篇幅不长,叙述简洁,但史实陈述准确,大致勾勒出了俄国汉学的发展脉络。从莫书后所列参考书目判断,俄国部分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巴尔托尔德所撰之《欧洲与俄国的东方研究史》(История из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а в Европе и в России),^①其他国家则主要参考了日本石田干之助的《欧美的中国研究》(《歐米に於ける支那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莫东寅对俄国汉学的评价,有些论述很有见地,可也有一些看法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比如他说:“自雍正初(1723)放逐西洋耶稣教士后,俄人在西人中,独擅研究中国之便利。唯研究成绩,以视耶稣会士,于质于量,大有逊色。”^②这一结论与当代俄罗斯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后者认为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的成就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欧洲,原因是比丘林等许多俄国汉学家的著作不仅在西欧国家被翻译出版,并且凭借深厚的汉语修养(因为这恰恰是从雍正禁教到鸦片战争期间西方汉学家的弱项)经常在与西欧学者的学术辩论中获胜。我们暂且不论孰是孰非,或者莫先生只是转述了欧洲汉学界对于俄国汉学的评价,单就莫先生首先将国际汉学作为一种学术进行研究的勇气、智慧和开拓精神而言,他理应受到现在每个汉学研究者的钦佩。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汉学发达史》一书在我国国际汉学研究史上的开创意义。

自莫东寅先生之后,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俄罗斯汉学研究。建国后,沙俄侵华史成为中俄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越生先生开始从事国际汉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并立志要为此“做出点事业来”。^③孙先生以他所主持的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为主要力量,曾编辑出版了一份不定期的辑刊——《外国研究中国》。此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1978年出版第一辑,到1980年5月,共出版了四辑。其中刊登了少量有关俄罗斯汉学的文章,但大多是苏联汉学家作品的译文以及当时苏联汉学界的动态报道。70年代末,孙先生开始筹划出版“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继《国外西藏研究》(冯蒸著)、《日本的中国学家》(严绍璁著)之后,他于1986年与姜筱绿女

① 巴尔托尔德本是突厥学家,但对俄国的东方学史多有研究。此书于1911年在圣彼得堡初版,1925年再版。德译本出版于1913年,日译本出版于1939年(昭和十四年)。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30页,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

③ 转引自严绍璁:《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载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五辑,第7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

士一道编写出版了《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①这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书中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俄国和苏联主要汉学家的简要生平、著作目录,介绍了重要的汉学机构,对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特别是孙越生先生撰写的序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依托中俄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背景,对俄罗斯近300年的汉学发展史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分析,深刻总结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对当今的俄罗斯汉学研究仍具有一定指导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该手册的缺憾也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苏联时期汉学家的著作没有附注原文,不利于使用者进一步查证,在史实、译名和俄文拼写方面有一些错误,此外,迫切需要增补20年来俄罗斯汉学的新成就。

在这一时期,中山大学的蔡鸿生先生在研究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历史的同时,对俄国汉学的特点和实质也进行了深入而精到的分析。^②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也曾对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做出贡献。他于1983年发表了《谈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对中俄文学关系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与以往研究者不同的是,戈宝权并非只谈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传播和研究情况,对俄罗斯汉学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第一次对中俄文化关系进行了“双向式”的思考。1962年李福清先生在苏联列宁格勒发现一部前所未见的《石头记》抄本,并于1964年与孟列夫合作撰文介绍,^③一度成为轰动国际红学界的大事,后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出版该抄本。《石头记》“列藏本”成功在华影印出版为中俄两国学者继续整理俄藏珍贵汉籍开辟了道路,为后来联合在华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积累了宝贵经验。

20世纪70—80年代,有几部重要的苏联汉学名著在我国翻译出版。1987年陈训明翻译出版了查瓦茨卡娅(Е. В. Заводская)的著作《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живописи старого Китая,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1989年郝镇华等翻译了列·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Проблемы генезиса кита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文物出版社,1989年)。在各类期刊杂志上还发表了一些俄罗斯汉学史研究专家论文的译文,如由姜筱绿翻译的米亚斯尼科夫的

^① 孙越生后来还编写了《美国中国学手册》,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1993年出版增订本。

^② 蔡鸿生:《评俄国“汉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兰州大学历史系编:《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 [苏]孟列夫、李福清:《前所未有的《红楼梦》抄本》(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Рифтин Б. Л.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писок романа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载《亚非民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1964. о. 5.)

《苏联中国学的形成与发展》(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①、列·瓦西里耶夫的《俄国的中国学泰斗——В·П·瓦西里耶夫》(Корифей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等文章。《国外社会科学》除了通报有关苏联汉学界的动态外,还刊登了华克生的《苏联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学概况》(Перевод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等论文。此外,部分俄罗斯蒙古学家、藏学家和满学家的作品也有所翻译,主要刊登于《蒙古学信息》、《满语研究》等杂志。

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大多是简单介绍,缺乏深层次的探究。第二,注重资料积累和整理。这项工作虽然烦琐,但在一种学术发展的初期,其意义非常重要,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第三,译文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学科处于初始阶段外,还因为缺乏从事真正意义上汉学研究的氛围。相对于几十年的时光,我国这一时期在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不能算多,从事这一研究的学者更是寥寥可数。但是,他们毕竟为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史进行了可贵的开拓,为后来人指引了一条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方兴未艾。原来从事外文、历史、中文以及哲学等学科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顺应时代的召唤,开始携手缔造一个新的学科——国际汉学研究。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对几乎所有汉学大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对俄罗斯汉学的研究。

从已发表的作品来看,北京大学的李明滨、天津师范大学的李逸津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然等人对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1990年,李明滨先生出版了《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第一次试图全面系统地介绍俄苏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情况。此书问世后引起了俄罗斯汉学界的关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齐佩洛维奇(齐一得)(И. Э. Циперович, 1918—2000)撰写了书评,对这部作品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写道:“李明滨的《中国文学在俄苏》是一部历史——书目概论。这是中国第一部

^①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外国研究中国》编者在该文前所加按语中称该文是于1971年召开的“全苏汉学家大会”论文集《苏联的中国学问题》(Проблемы совет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73.)中的一篇。笔者经核对发现此说有误,因为该文集中并没有收录此文。

独立的著作,对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18世纪俄国汉学产生,一直到目前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研究状况,这些无疑是其主要功绩。”^①1993年,李明滨出版了《中国文化在俄罗斯》(新华出版社),作者在文学之外,又增加了一些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的内容,并在前言中提出在俄罗斯历史上出现过三次中国文献翻译和研究热潮,分别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50、60年代以及80年代。1998年10月,李明滨出版了《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比较详尽地回顾了中俄两国自17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历史。作者综合了前两部著作的内容并进一步加以充实,重点介绍了中国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在俄国及苏联的介绍和研究情况,但对历史、语言等方面则略而未述。李逸津先生在《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②中叙述了俄罗斯对中国古典文论的研究,重点介绍了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翻译和研究,同时分析了李谢维奇(И. С. Лисевич, 1932—2000)、郭黎贞(К. И. Гольгина, 1935—)、波兹涅耶娃(Л. Д. Позднеева, 1908—1974)和华克生等人在中国古典文艺理论领域的探索。2000年,他又与其他学者一道完成了《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③,总结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国戏剧在俄罗斯的流传、翻译和研究情况。同年,他在《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④一书中负责撰写有关俄罗斯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俄苏汉学家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成就。他就俄苏汉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古典散文以及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得失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观点。理然先生于2000年发表了《帝俄时期:从汉学研究到中国文学研究》^⑤一文,对18—19世纪俄国早期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在俄罗斯汉学史研究领域,1994年蔡鸿生教授出版了《俄罗斯馆纪事》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此书既是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研究的力作,同时对我国俄罗斯汉学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蔡先生以他深厚的史学功底及外语修养为依托,采取中俄文献相互补正的方法,穷尽资料,对俄罗斯汉学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考证和分析,取得了深刻的认识。由马祖毅、任荣珍所著的《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属于翻译史著作,介绍了中国典籍的翻译和域外传播,其中也涉及到了俄罗斯。但此书通篇不注明引文出处,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

① [俄]齐一得:《评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苏〉》“Ли Мин-бинь.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Росс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Гуанчжоу.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ачэн чубаньшэ’. 1990. 300 с.”)载《圣彼得堡东方学》(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ып. 3. СПб., 1993.)

② 王晓平、周发祥、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文论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④ 夏达康、王晓平主编:《二十世纪国外中国文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 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四集,中华书局,2000年。

俄文印刷错误更是严重。1999年,郭蕴深在《19世纪俄国汉学的发展》(《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一文中勾勒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汉学的发展历程。黄定天在其《中俄经贸与文化交流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介绍了苏联新汉学的特点及成就。同年,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出版《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钩沉了胡适与钢和泰(Александр фон Сталь-Гольштейн,1877—1937)、王静如与聂历山、杨树达与阿列克谢耶夫等中俄学者在20世纪初的学术交流往事。2000年以来,笔者发表了一系列俄罗斯汉学研究论文,如《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瓦西里耶夫与俄罗斯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试论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研究的民族化》(《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帝俄蒙古学的历史与成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18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夏之卷)、《郎喀使华与早期中俄文化交流》(《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另在《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和《国际汉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详细考察了18、19世纪的许多著名汉学家的成就,并就俄国汉学的历史、成就以及影响等问题进行思考。笔者翻译出版了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所著的《1907年中国纪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主持并完成了以俄罗斯汉学研究为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在南开大学俄语语言文学学科内招收该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01年,由南开大学张国刚等著的《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撰写了其中有关俄罗斯汉学史的章节,对18—19世纪俄国汉学的发展轨迹与成就进行了描述。2002年,由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对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瑞典、荷兰、日本、韩国以及东欧国家的汉学进行了概述。俄罗斯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陈建华教授执笔,简要介绍了俄国和苏联时期的主要汉学家、汉学成就、汉学机构以及汉语教学情况。2003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柳若梅发表《独树一帜的俄罗斯汉学》(《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对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进行了探讨。

一些由俄罗斯学者撰写的涉及汉学史研究的著作也陆续被译介到我国,其中最有名的是由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所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СССР проза, драма)。该书是李福清先生1981年来华访问时应《文献》杂志之约而写,由田大畏译成中文,于1987年在北京出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此书着重论述了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在苏联(也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但可惜对其他文学体裁未加著录。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小说和戏曲一直是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重点,另外也与作者的研究领域有关(李福清先生即以研究中国民间文学和

古典小说见长)。此外,一些俄罗斯汉学家的论文也不断见诸书刊,如李福清撰述、田大畏整理的《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世纪上半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年第1、2期)、布罗夫(В. Г. Буров, 1931—)的《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17世纪末—20世纪末》(连载于台湾《汉学研究通讯》,第14卷第4期,第15卷第1、2期,1995年12月,1996年2月、5月)、古多什尼科夫(Л. М. Гудошников, 1927—)与斯捷班诺娃(Г. А. Степанова, 1933—)合著,由赵国琦翻译的《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国学》(《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等等。

我国研究者对中国历史、哲学、宗教、艺术在俄罗斯的研究状况也已开始关注。1997年由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国际汉学漫步》(河北教育出版社)收录了彭迎喜的《瓦西里耶夫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程英姿的《查瓦茨卡娅与中国绘画美学》。郑天星先生对中国道教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做了研究,在《国际汉学》第二、九辑上分别发表了《道教文化研究在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汉学:道教研究》。2002年,陈开科先生撰文详细介绍了《论语》在俄罗斯的传播和研究情况,对各种俄文译本的特点进行了分析^①。

在目前国内掌握俄语的学者数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俄罗斯汉学著作翻译就成为推动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前提和条件。然而,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依然非常有限。90年代以前,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 VII веке*)是被翻译成汉语出版的最重要的苏联汉学家的成果。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观,在华出版的俄罗斯汉学论著渐渐多了起来。就数量而言,李福清的著作被翻译成汉语的最多(有的专著是他直接用汉语写成的)。除了上述有关俄罗斯汉学史的论著外,他的许多中国民间文学和古典小说的著述也被译介到我国,如1988年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神话故事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汉文古小说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于1993年和1997年出版了他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与《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и фольклорная традиция в Китае*),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神话与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此外,他的许多著作在台湾出版或再版,如《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2003年中华书局为纪念李福清先生诞辰70周年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古典小说与传说》。宋绍香先生翻译了费德林等十余位俄罗斯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22篇,于1994年以《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为题结集出版(新华出版社)。1995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① 陈开科:《论语之路——记历代俄罗斯学者对论语的翻译与研究》,载《汉学研究》第六集,中华书局,2002年。

了由赵永穆编选的《费德林集》,共收录费德林中国文学研究论文 16 篇。

90 年代以来,中俄两国学者学术联系日益密切,在合作出版俄藏中国文献以及开展其他方式的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1990 年李福清与王树村共同编辑、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在中国和苏联分别出版了中俄文两个版本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Редк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картины и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браний*)。1992—2001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以及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编辑部合作编写出版了 17 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Рукописи из Дуньхуана коллек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主编为俄罗斯敦煌学家孟列夫与我国学者钱伯城先生,首次使长期与世隔绝的俄藏敦煌文献得见天日,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欢迎。1996 年,中俄学者再度合作,开始整理出版 20 世纪初由科兹洛夫掠到俄国的黑水城西夏文书,书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此书的俄方主编是著名汉学家克恰诺夫,中方为史金波和魏同贤先生。199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孟列夫于 1963 年、1967 年主编的《俄藏敦煌汉文写卷叙录》。此外,该社还于 1993 年出版李福清发现并编辑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1966 年,李福清在苏联发现中国久已失传的清代曹去晶的市井小说《姑妄言》。1997 年,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在《思无邪汇宝》第 36—45 册中刊出了《姑妄言》,1999 年 1 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推出了简本,以后又有数家出版社出版了全本。

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但从目前情况看,依然存在许多问题,阻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快速发展。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研究队伍小,人才培养滞后。因为在目前汉学经典著作还没有完全被翻译出版的情况下,精通外语是从事国际汉学研究的首要条件。而在英语盛行的今天,学俄语的人数呈萎缩趋势,致使许多对俄罗斯汉学感兴趣的学者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涉足此领域。同时,国际汉学研究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语际研究,不仅涉及有关中国文化本身的知识,而且还涉及中外文化的冲突和碰撞。只有培养同时具有深厚中外文化素养的后备人才,才有可能推动这一学科的长久发展。

二是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各子学科研究极不平衡。严绍盪先生在《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一文中指出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四个研究范畴:中国文化向

域外传递的轨迹和方式 ;对象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容纳、排斥和变异的状态 ;外国的中国观 ;外国学者具体研究成果和方法论。李学勤先生在《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一文中,提出了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应该回答的六大问题:国际汉学的起源及发展道路,即汉学史;国际汉学界在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外国汉学家从事研究并完成其著作所依赖的思想文化背景;国际汉学成果对中国学术的影响;国际汉学对西方学术的影响;国际汉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俄罗斯汉学研究。但是,中国学者只是在俄罗斯汉学史和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译介情况方面做了一些介绍,需要填补的空白还很多。对俄罗斯在中国哲学、宗教、艺术、历史、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中国学者少有论及。至于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流传和变异,以及俄罗斯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观等属文化比较类型的题目,就更是待开垦的处女地了。

三是由于俄罗斯汉学研究长期以来未受到重视,资料的积累非常薄弱。除国家图书馆外,各省和各大学图书馆俄文进口图书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研究者难以及时看到俄罗斯最新出版的汉学著作,不能尽快对其作出介绍和评论。

在以上几点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才问题,否则将难以从根本上推动该项研究的发展。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在培养国际汉学研究人才方面已有起色。北京大学自严绍盪先生开始培养专门研究国际汉学的研究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范围内招收从事国际汉学研究的研究生。这些在人才培养上的创新举措为这门学问的壮大和发展提供了可能。

译介俄罗斯汉学著作是促成中俄两国学术对话的前提。在当前能阅读俄文原著的学者数量非常之少的情况下,译介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出版“俄罗斯汉学经典译丛”的工作应尽快启动。但同时也应指出,翻译汉学著作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任务。汉学著作大都是汉学家穷数年或数十年之功对某一问题研究心得的集成,与翻译文学作品相比(仅指思想转达层面),对译者的知识修养要求更高。“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①近年来翻译出版的西方汉学论著中,由于对某一专门领域知识的缺乏而导致的误译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在培养汉学研究者的过程中,还要重视提高他们翻译汉学论著的能力。

^① 王楠:《对汉学论著翻译规范的探讨》,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

此外,我们应继续提高在俄罗斯汉学史以及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在遵循学术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进一步开拓视野,加强对俄罗斯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在俄罗斯的吸纳和变异等课题的研究。对俄罗斯汉学进行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个随着知识积累和认识水平提高而不断加强研究深度和拓展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过程。

最后,只有加强同俄罗斯汉学家的学术交流和对话,及时了解俄罗斯汉学界的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有的放矢,得以进步。从“五四”以来,我国学术界与海外汉学界就一直保持着一种互动的关系,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与罗振玉、张元济就敦煌文献的讨论,陈寅恪与英国汉学界的交往,胡适与俄国汉学家钢和泰的友谊,已成为学术界的佳话。阿列克谢耶夫与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的著名学者袁同礼先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在其档案中至今保存着袁先生于1926—1946年间写的68封来信。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精辟地指出,“在中国的国学面前,欧洲汉学不仅是学生,同时也是先生”^①。中俄两国学者在这种互动中都受益匪浅。近年来我国学者与俄罗斯汉学界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到对方国家进修、访问和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越来越多,为及时交流信息和获取研究资料提供了很大方便。李福清院士于2001年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定期来华讲学,提供资料、交换信息,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国的俄罗斯汉学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2002年8月26日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十四届欧洲汉学家大会上指出:“俄罗斯每年出版研究中国的专著70多部。俄罗斯汉学家分布在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到伯力和海参崴的近40家科学中心。”^②如此庞大的研究规模,如此数量的研究成果,继续显示着俄罗斯汉学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而随着现代资讯手段的进一步发达以及汉学成果传播速度的加快,俄罗斯汉学在中俄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而与此相伴的,理应是我国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① 瓦·阿列克谢耶夫:《汉学家工作书目指引》(Алексеев В. М. Рабоч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йста. Книга руководств для изучающих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у Китая),阿列克谢耶夫遗作手稿,班科夫斯卡娅(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提供。

② Вступ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оргкомитета XIV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ЕАК член-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РАН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http://www.ifes-ras.ru/graph/novosti/EACS_ru.asp(2003-01-01).

阿瑟·魏理年谱简编^①

□程章灿

阿瑟·魏理(Arthur D. Waley)是20世纪英国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中日古代典籍的翻译与研究,涉及诗歌、小说、辞赋以及变文等多种文体,他所翻译的《诗经》、《论语》、《道德经》、《源氏物语》早已成为翻译名著,他所翻译的中国古代诗歌甚至被选入当代英语诗歌选本。他为李白、白居易以及袁枚等三个中国诗人所写的文学传记也脍炙人口。他的翻译与著作大大增进了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理解,而且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魏理毕生从事汉学研究、中日文学翻译以及著述,对20世纪东西方尤其是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欧美以及日本学术界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可是,他的生平与学术在中国却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和重视。有感于此,笔者特编写本谱,其凡例如下:

① 本文是本人所承担的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项目《魏理与二十世纪英国汉学》以及 K. C. Wong Fellowship of British Academy 资助项目 Dreaming of the East :Arthur Waley and 20th Century British Sinology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前牛津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霍克思(David Hawkes)、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所长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以及前牛津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为我提供了生活和工作上的许多方便和帮助,日本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弘教授多次以有关魏理的资料慨然相赠,深情厚谊,谨此致谢。(编者按:本刊在选登本文时有删节)

一、本谱重于魏理之翻译著述及其在学术研究,尤其是有关汉学方面的翻译与著述,以期使国人对这位伟大的翻译家、学者有较多了解。

二、魏理一生著述宏富,本谱对其著作一例加注出版社,论文则注明刊名刊期。

三、魏理所撰书评及一般文章甚多,本谱按年份总叙,不一一分别列叙,以省篇幅。

四、魏理之译作和著作多次重印,除了重要的、修订幅度较大的再版外,本表对一般的重印本不单列举,而只在附注中简要介绍。

五、为避免繁冗,将主要参考书目一并列于最后,而在谱文叙述中一般不再开列。

1889 年

8月19日,阿瑟·大卫·魏理(Arthur David Waley)出生于英国东南部肯特(Kent)郡敦布里奇·威尔斯城(Tunbridge Wells)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本名阿瑟·大卫·许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

按:此城在伦敦东南约60公里。

祖父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是在曼彻斯特经营棉纺织品贸易的商人,1835年从德国迁居英国。父亲大卫·弗里德里克·许洛斯(David Frederick Schloss, 1850—1912),是一个经济学家和费边社会主义者,母亲瑞彻尔·索菲亚(Rachel Sophia, 1864—1940),是伦敦大学首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亚科布·魏理(Jacob Waley)之女,二人于1886年结婚。婚后育有四子,长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David Waley, 1887—1962),次子出生四个月即夭折,第三子即阿瑟,第四子休伯特(Hubert David Waley, 生卒年不详)。

按:因阿瑟之上有一子夭折,故有些文献(如《英国传记辞典》(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1961—1970)))称阿瑟为第二子。

1890 年 1 岁

在敦布里奇·威尔斯城。

按:谱主为西方人,故本谱计算年龄方法依西方习俗。本年魏理1岁。童年在温布尔顿(Wimbledon)度过。

1896 年 7 岁

本年,在走读小学。

1897 年 8 岁

本年,入奇尔弗顿·埃尔姆斯(Chilverton Elms)寄宿学校。